

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追问

舒红跃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 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论在当今哲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评价是否定性的。文章从两个方面对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论进行追问:第一,海德格尔哲学是存在哲学而非技术哲学,他对技术有着各种偏见和误解;第二,我们可以尝试利用现象学运动之内和之外的各种资源来走出海德格尔式的技术迷思。

[关键词] 海德格尔; 技术; 技术哲学; 追问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3-0048-06

不管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美或其他国家,把技术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哲学家寥寥无几,海德格尔则是其中之一。既是因专门研究技术的哲学家很少,也是由于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论对技术哲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评价是否定性的,他给现代技术贴上了“座架”这一标签。国内外技术哲学界,特别是人文主义倾向的技术哲学之所以对现代技术持一面倒的负面评价,是与海德格尔的这一标签式评价有着莫大关系的。海德格尔式的技术评价不仅没有真切中技术的本质,而且妨碍对技术的本质做出正面和积极的解读。

一 海德格尔哲学:是存在哲学还是技术哲学?

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研究中,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是影响最大的一面旗帜。究其原因,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家群星璀璨,把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家则凤毛麟角。由于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媲美于康德的地位,因而不管是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还是不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所有的技术研究都必须谨慎地面对他的技术理论。然而,虽然海德格尔的很多著作和文章都提到技术,但是,不管是早期的《存在与时间》(1927年),还是晚期的《技术的追问》(1950年)、《科学与沉思》(1953年)等,技术在他那里只是他追问存在的一个“视野”、手段或途径,技术在他的研究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

首先看技术在《存在与时间》这部海德格尔最

有影响的著作中起什么作用。从书名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这部著作有两个最主要的关键词:一是“存在”,一是“时间”。这两个关键词的重要性又不一样,“时间”是海德格尔通达“存在”的一种通道。在《存在与时间》导论“概述存在问题的意义”最后一节“本书纲目的构思”中,海德格尔对该书的写作纲要做过交待。海德格尔原计划该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步的标题是“以时间性阐释此在,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问题的超越的视野”,第二部的标题是“以时间状态问题为指导线索对存在论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析的纲要”。海德格尔只完成了原计划第一部分的部分内容(计划写3篇,最终只出版2篇),也就是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问题的超越的视野。

《存在与时间》第1页写道:“具体而微地把‘存在’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是本书的意图。其初步目标则是对时间进行阐释,表明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1]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存在与时间》的意图,更准确地说是首要意图,是具体而微地把“存在”问题梳理清楚。其二,梳理存在问题首先必须对时间进行阐释(海德格尔用的是“初步目标”),因为“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其三,海德格尔之所以研究时间,是因为在他看来,时间是理解任何一种存在之“视野”。所以,海德格尔明确告诉我们,虽然时间在《存在与时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时间仍然只不过是海德格尔研究存在问题的一个“视野”或平台而已。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存在与

[收稿日期] 2015-03-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人类生活方式”资助(编号:08BZX024)

[作者简介] 舒红跃(1964-),男,湖北鄂州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时间》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存在”。

《存在与时间》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是“存在者”。《存在与时间》影响最大,在海德格尔整个基础存在论中最重要的命题无疑是——“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现象学的口号是“面向实事本身”,胡塞尔所面向的实事是先验自我,也就是我思或意识;海德格尔所面向的实事是存在。胡塞尔的解释学循环是“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是“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尔追问存在,而存在似乎总是让我们无从下手,我们只能从存在者的存在中追问存在。此在(Dasein)在《存在与时间》中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概念,但此在再重要也不过是众多存在者中的一个而已。不过,这个存在者确实与众不同。海德格尔认为,在所有存在者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存在者,这种存在者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它还能够对存在进行发问,这就是“此在”。如何研究这种具有特殊本质的存在者?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在世界中存在的,这种日常在世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这种打交道分散在形形色色的操劳方式中。此在在操劳中打交道所面对的并非传统存在论所认为的作为具有实在性、物质性和广延性的“物”,而是具有实用性的“用(器)具(Zeug)”。

古希腊人在谈到物时指的是人们在实践中与之打交道的东西,即人们对事物的烦恼着的先行占有。按照古希腊人这一思想,海德格尔把人们在日常烦恼中所遇到的每一种东西都称之为“用(器)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读书的用具、工作的用具或游戏的用具,它们指的是我们为了读书、工作或游戏而使用的东西。根据这一理解,以任何方式具有一种“为了……”作用的东西都可称之为用具,用具是一种“为了作……的东西”。要制作的产品,如作为螺钉、车轮、汽车的何所用,它们也具有“用具”的存在方式。制作好的产品、用具,不仅指向它的合用性的何所用、它的成分的何所来,即使在最原始的手工业生产中,它同时也指向它的承用者和利用者。所有产品无一例外都是依承用者和利用者的情况制作的,在产品的产生过程中承用者和利用者一道“在”那里。操劳活动所制作的产品是为承用者和利用者而上手的。承用者和利用者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也随着这种存在者来照面,而那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操劳所及的工件不仅在工场的家庭世界中上手,而且也在公众世界中上手。周围世界的自然随着这个公众世界被揭示出来,成

为所有人都可以通达的。在小路、大街、桥梁、房舍中,自然都在一定的方向上为操劳活动所揭示。带顶棚的月台考虑到了风雨,公共照明设备考虑到了黑暗……”^{[1]83}。

德国哲学家比梅尔在提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对技术的分析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海德格尔对‘器具’(Zeug)的分析是《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部分之一。可是这一分析的意义却很少有人懂得。”^[2]比梅尔在这里所说的很少有人懂得的意义,是指海德格尔对“上手”,也就是实践、操作或动手态度的强调。海德格尔对技术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强调了技术、实践态度相对于科学、理论态度的优先性。问题是,虽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涉及到对技术(用具)的分析,且这一分析很精彩,但是,海德格尔的本意并非分析技术,在他那里用具只是他分析此在在世存在的一个中介,他的哲学是存在哲学而非技术哲学。《存在与时间》两大关键词是“存在”与“时间”,就连“时间”也不过是海德格尔研究“存在”的视野而已。所有“存在者”,即使是那个最特别的、能够追问自身存在的存在者,在海德格尔这里都是用于追问存在的,更别说让此在陷入非本真存在的各种用于操劳的用具了。总体来说,对技术的分析在《存在与时间》这部长篇巨著中犹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海德格尔早期在技术问题上着墨有限,晚期有一系列专门研究技术的文章,他对技术哲学发生影响的主要是他晚期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期,海德格尔发表了多篇研究技术的文章,其中主要有《技术的追问》(1950年)、《物》(1950年)、《筑·居·思》(1951年)、《科学与沉思》(1953年)等等。然而,尽管海德格尔晚期花在技术问题上的时间和精力比早期多,但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离不开早期的窠臼,只不过把早期的“世界”换成了“天地神人”四重奏的圆舞曲,技术只是他追问存在的又一个中介而已。同早期一样,后期的海德格尔那里也不存在面向技术这一实事本身的“技术哲学”,他晚期所面对的现象学实事还是存在。海德格尔一生孜孜以求,始终不离其中的是存在哲学,他并无本意,实际上也没有建立“技术哲学”。对于海德格尔,技术只是诸多存在者中的一员,他之所以追问这一存在者,只是因为“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离开存在者对存在无从下手,至于这一存在者是此在、技术还是其他,其间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最终目的都是追问存在。海德格尔《筑·居·思》中开门见山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下面我们要尝试对栖居和筑造作出

思考……这种思想尝试根本不是从建筑艺术和技术方面来描述筑造,而是把筑造纳入一切存在者所属的那个领域中而来追踪这种筑造。”^{[3]1188}

总之,不管是《技术的追问》、《物》,还是《筑·居·思》,它们事实上并不关心具体的技术问题,而是追踪技术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追踪筑和居(具体存在者)后面的思想(存在),或者发动思想去追溯技术(筑和居)后面的意义(存在)。所以,同早期一样,海德格尔晚期的技术研究也是他研究存在的一件“嫁衣”,尽管这件“嫁衣”很“漂亮”,甚至在很多人看来很“管用”。技术,在海德格尔哲学中从来没有进入中心和核心的位置,始终只在边缘徘徊,偶尔享受一下海德格尔“青睐”的目光。

二 走出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困境

海德格尔研究的是存在,虽然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但存在者只是他追问存在的一种手段。任何存在者,包括此在在内,在海德格尔眼中都是追问存在的一个环节或手段,都是可以取代或舍弃的——哪怕是海德格尔早期所有存在者中唯一能够对自身的存在进行追问的那个最特别的存在者,“此在”,在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都退居幕后,更别提无法对自身存在进行追问,只是此在在世存在一个环节的用具罢了。

正是由于技术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只是一个过客,是他阐释存在或他的存在哲学的一根拐杖,所以海德格尔无法做到“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对待技术。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哲学是用“诗”的语言表述的“思”的哲学,而技术是动手、是做,所以要想海德格尔公平地看待技术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早期《存在与时间》中有关用具对此在生存方式的影响,还是晚期对技术的“座架”式评判,海德格尔对技术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乃至偏见。由于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影响,他的这一误解和偏见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不仅学术界很多人带着有色眼镜看技术,而且社会上很多民众也对技术持负面评价。

海德格尔对技术,特别是现代技术的负面评价在他晚期的技术观中得到了非常突出的表现,如他提出在技术哲学中无人不知的“座架”概念。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之中,“座架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3]942}海德格尔的“座架”,主要是指技术作为“限定”和“强求”的性质,德国哲学家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一书对此做过详细解读。海德格尔作为

“座架”的技术在8个方面实现它的“限定”和“强求”: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主客两极化、谋算、贯彻和统治、生产和加工、耗尽和替代^[4]。面对技术“座架”式的强迫,海德格尔认为,既然我们无法完全摆脱技术,我们对待它们的最好方法是“泰然处之”。问题是,人类现在生活在工业社会,而非海德格尔所眷恋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人类具有农业社会的人无法比拟的自由和自主性,海德格尔的顺从“座架”、在技术面前“泰然处之”的态度,会因无法认清技术的真实面目而让他的技术分析陷入隔靴抓痒的尴尬困境。

由于海德格尔技术理论在当今技术哲学中的影响,海德格尔技术观的困境也是当今技术哲学的困境。要想摆脱这一困境,目前必须做的一项任务是走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克服海德格尔技术观的迷思。虽然海德格尔哲学总体上是现代哲学,但是在对待技术这一问题上,海氏仍然落入了传统哲学的窠臼。德国哲学家波塞尔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完全适合于海德格尔。“就哲学领域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传统哲学把对科技的反思拒斥于哲学的大门之外,所以,许多哲学家今天甚至更偏好对工艺制品进行反思,并把它们理解为文化的表达,而不是专注于机械工艺制品(就像人们在17世纪所说的那样),机械制品也属于我们的文化,而且自始至终都对我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5]

走出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迷思的工作已经开始,国外早就出现了一批试图走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家。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技术分析,技术在这些哲学家的眼中不是“视野”,不是“过客”,技术在他们的哲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在他们的整个哲学研究中起着核心和基石的作用。技术哲学要想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要想作为哲学众多部门中的一员得到承认,技术必须成为哲学分析和研究中的“常客”,成为哲学研究者眼中重中之重的研究对象。当今把技术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试图摆脱海德格尔技术观迷思的哲学家很多,其中两位很有代表性,一位是美国哲学家艾尔伯特·伯格曼,一位是欧洲大陆哲学家,法国人贝尔纳·斯蒂格勒。

伯格曼是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伯格曼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M·缪勒,M·缪勒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伯格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专门研究技术问题的技术哲学家。伯格曼的成名作是他1984年发表的《技术与当代生活中的特质:一种哲学探索》。除该书外,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技术与现实》(1971)、《技术的方向》(1972)、

《科学和技术解释中的功能主义》(1973—1975)、《心、身与世界》(1971)、《论技术与民主》(1984)等。伯格曼的研究生涯都是围绕着技术问题展开的。

同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伯格曼的技术哲学重点不是对技术进行形而上的分析和论证,而是通过对现代技术不同于传统技术的特点的分析——这一分析体现在他的器具(技术)范式的概念之中——探讨如何实现对现代技术的变革。伯格曼的技术改革围绕着“聚焦物”、“聚焦活动”和“聚焦关注”展开,其中“聚焦物”(“Focus thing”)是伯格曼技术哲学最有启发性的概念。伯格曼认为需要区分两种技术改革:一种是在技术范式之内的改革,一种是对技术范式本身的改革。技术范式之内的改革是对器具范式的修补,反而会增强技术的统治。只有对技术范式本身的改革才会提供对待技术的新的态度和方法。

伯格曼认为,虽然今天人们对待现实的典型方式是技术,器具代表了现代技术的本质,但器具范式不是人们唯一的生活方式,人们还在跟其它事物,特别是各种聚焦物打交道,从事各种聚焦活动。“虽然我们的世界承受着技术的印记,但技术的范式既不明显,也不是唯一地统治着这个世界。它与各种聚焦物和聚焦活动进行竞争,并威胁和破坏这些聚焦物和聚焦活动。而聚焦物和聚焦活动以一种不同的、深刻的方式集中和打点着我们的生活”^[61]。海德格尔通过对一些简单事物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伯格曼也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经验事物的分析来建立自己的哲学基础。他首先从词源上分析“focus”。拉丁语中“focus”意味着炉边。在前技术时代,房中的壁炉构成一家人温暖、光明和生活的中心。对于罗马人,“focus”是神圣的,是家庭守护神居住的地方。刚出生的婴儿只有被抱放到炉边之后才成为家庭正式的一员。罗马人的婚姻是在壁炉旁边得到“恩准”的。壁炉不仅维系、安置和聚集着室内的一切物品,而且还维系、安排和聚集着全体家庭成员。“Focus”在现代英语中是一个几何学和光学术语:镜片或镜子的焦点,一个各种光线向它汇聚又从它向外发散的点。聚集在某物上或以某物为焦点就是使它成为中心,成为聚焦点,并得到澄清和说明。“Focus thing”是指一个汇聚它所处环境中各种自然、文化和历史关系的事物,可称之为“聚焦物”。

伯格曼把围绕聚焦物展开的活动称为聚焦活动,聚焦活动的目的是认同对聚焦活动具有中心地位的聚焦物,守护聚焦物的深度和完整,使它具有对

抗技术范式统治的能力,从而免遭技术范式“手段——目的”的割裂。让世界(技术世界)善待聚焦物是伯格曼技术变革的核心。伯格曼的技术改革既不是对技术范式的改变,也不是对它的拒绝,而是对它的理解,把它限制在适当的方面,以便让聚焦关注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受到限制的技术范式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生活世界,不过它只是聚焦物和聚焦活动的背景和外围。“技术能够完成一种新型的自由和富裕的承诺。如果我们的生活集中在聚焦关注上,技术将真正地展现出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允许我们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它将使我们免于偶尔的时间短缺、设备缺乏或身体虚弱,转向世界上具有自己品性的伟大事物。”^{[6]248}

斯蒂格勒也是一位既同海德格尔哲学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同时又试图走出海德格尔哲学的哲学家。斯蒂格勒是德里达的学生,他的《技术与时间》是当今技术哲学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作为斯蒂格勒的成名作,《技术与时间》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对吉尔、勒鲁瓦—古兰和西蒙栋的技术理论的梳理,也有从技术角度对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解读;既有对康德的“三重综合”、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借鉴,也有从技术视角对德里达、利科思想的阐释。同伯格曼一样,斯蒂格勒也是一位专门研究技术问题的技术哲学家。海德格尔站在技术之上分析技术,缺乏对技术的实证性研究。斯蒂格勒通过海德格尔未能掌握的大量古生物学、历史学和民族学领域的原始技术资料,从技术“之上”进入技术“之内”,提出了一种新的此在生存性论证——此在从技术中诞生。《技术与时间》第1卷的副标题是“艾比米修斯的过失”,它主要研究人类的起源。

人类从何而来?神话起源在斯蒂格勒那里只是一个隐喻,他把人类的起源与技术联系起来,从技术的角度解释人类的诞生。先有“人”,然后创造“技术”;还是先有“技术”,然后才导致“人”的产生?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斯蒂格勒借用德里达创造的“延异”[“延异”(différance)一词由德里达创造,在词源学上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延迟,一是不同一、可区分。现有法语“différence”一词不能完全覆盖上述特征,德里达创造了“différance”一词]一词来解决这一问题,认为需要从运动和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人与技术的关系。众所周知,“谁”代表人,“什么”代表技术。斯蒂格勒认为这一“熟知”并不等于“真知”：“谁”难道不能是技术,“什么”难道不能是人?斯蒂格勒借用民族学、考古学等史实来颠覆传统的“熟知”。考古学告

诉我们,石器技术的进化非常缓慢,数千年、数万年石器的打制技术进化得难以让人觉察,无法让人想象人是这一进化的操纵者。既然人类不是这一进化的发明者,能不能假定人是在这个进化中被逐渐发明的呢?斯蒂格勒认为,“人”的发明关键在于将“谁”(不一定是人)和“什么”(不一定是技术)并列,即使二者相连,又使二者相分。德里达的“延异”在这里起作用:它既不是“谁”,也不是“什么”,而是二者的“互动”,是二者的交叉与融合。缺了“什么”,“谁”不存在;缺了“谁”,“什么”不存在。“谁”和“什么”之间的过渡是一种投影:大脑皮层在石器岩层中的投影,岩石恰似大脑原初的镜子。所以,是工具即技术发明了人,而非人发明工具,或者说,人与技术是一个同时发明的过程,二者是一种“延异”的关系。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人类的记忆载体,因为只有石器向人类身体之外的投射才能使人类的技术超前(anticipation)成为可能。没有石器这一技术性的记忆载体,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已经在世界中的存在,人类也就不可能和时间(过去的历史)发生关系。我们赖以在世界中的存在,先于我们的世世代代的生存的记忆,是通过石器这类技术性的载体世代相传的。我们的祖先过去的生存经验,只因这种载体的存在而避免因祖先的死亡而消失,这同生物领域的遗传规则相反,因为祖先的肉体一旦死亡就不再在世间存在。斯蒂格勒认为,燧石既是人类劳动、计划和超前的对象,同时也是保留人类生存经验的记忆载体。虽然东非人的时间仅在于手中的石头,但是这个保存着祖先世世代代生存经验的世界已经和海德格尔的世界截然不同。原始人手中的石器是一种无生命而又生命化的记忆,它是定义人之为人必不可少的外在化的物体。在非技术的有机生命中,一切后天生成的经验都随生命个体的消亡而烟消云散。人类生命则保存和积累了后天生成的在世存在的历史和经验。这说明在生命和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如果说个体是一种有机体(有机化的个体),那么在关于‘谁’的问题上,它同环境……的关系是由一种有机化而又无机的物质为中介来实现的,这就是工具”^[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认为,“什么”在被“谁”发明的同时也发明了“谁”。人类与技术之间因此而摆脱了海德格尔“座架”式的的关系,技术不再是摆弄人、促逼人的因素,而是人之为人必不可少“孪生兄弟”。

在现象学传统内对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家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涉及。

然而,走出海德格尔技术观的迷思仅仅在现象学运动内部是无法做到的。真正走出海德格尔的技术迷思还需要借助其他学派哲学家对技术的思考。技术如何才能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或“聚焦物”?这需要面向技术这一实事本身。不同于科学的“思”,技术是“做”,做是需要动手的,而手又是人类身体上的一个器官。重视手、重视身体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作用的哲学家不多,其中一位是法国生命哲学创始人柏格森。柏格森对生命、对身体的重视可以让技术哲学开启一条不同于现象学的研究道路。

柏格森最重要的著作是《创造进化论》,它研究生命的进化,目的是用一种真正的进化论取代斯宾塞的伪进化理论。柏格森认为,斯宾塞的进化论把已经进化的现实切割成碎片,然后把这些碎片组合起来,去解释事先已经设定的东西。柏格森的进化论着眼于现实的生成和发展。尽管由于缺乏资料,不能重建进化历史的具体细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分辨出其中的主线。“动物和植物不久就必然从它们共同的祖先中分离出来,植物因固定不动而陷入沉睡,与此相反,动物变得越来越醒悟,并朝获得神经系统之路迈进。”^{[8]143}经过不断努力,动物最终创造了虽简单却能运动的有机体。

柏格森认为人类进化从制造原始工具的时代开始,工具是人类乃至整个生命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理性观点看,仅次于人类的是猴子、大象等动物,它们在一定场合能使用已经被制作好的工具。再次是那些能识别被制作物品的动物,如狐狸能识别人类设置的陷阱。只要有推理的地方就会有理性,推理就是把过去的经验运用于现在,这就是发明的开端。历史和史前史的事实是,人类是“工人”而不是“智人”。“智能,从似乎是它的原初特征来看,是一种制作人造物,特别是制造用以制作工具的工具有的能力,以及无限改变这种制作的能力。”^{[8]153-154}

一般人眼中,人类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动物因没有理性而没有工具。柏格森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动物也有工具,它们的工具是它们使用工具的身体的一部分。柏格森把理性和本能的区别与对不同工具的使用联系起来:“完善的本能是一种使用,甚至是构建有机化工具的机能;完善的智能是制作和使用非有机化工具的能力。”^{[8]155}柏格森认为,本能与理性这两种不同活动方式的优缺点显而易见。本能的优点是可以随时使用工具,并且这种工具能够自我制造、自我修复。不过,本能虽然便捷,但却有缺点,就是只能限于特定的目的而使用特定的工具。

通过理性制造的工具是不完善的,然而,由于这种工具是由无机物质制成,它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用于任何目的,所以它反而能给予生物无限的力量。

同海德格尔一样,柏格森对技术也有一些批评,但与海德格尔“座架”式技术观不同,柏格森对作为“生命冲动盆口的技术”的看法相当正面。柏格森认为,生命在进化过程中离不开技术,不管是器官化技术还是非器官化技术,特别是后者。在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物质是生命进化必须克服的“硬”力量。制造工具就是使物质变样,把它们变成工具,甚至占为己有。“正是这种掌控使人类受益,它甚至远远超过发明本身所带来的物质上的成就……虽然这种好处是所有发明者所追求的,但是,与发明在每一个方向上可能产生的新的观念和新的情感相比,这种好处微不足道。发明最重要的影响似乎就是发明可以让我们超越自身,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8]201}

根据柏格森的理解,哲学不在于实现自由与物质、精神与肉体的对立。自由和精神为了成为它们自身,应该在物质(身体)中证实自身。《创造进化论》的关键,“是用作为必然性本身的物质来创造一种自由的工具,来构成一种克服机械论的机械论。物质是障碍,但它也是工具和诱因。整个事情似乎是这样发生的:漂浮在水上的精神,从一开始就要求为自己构造出自我揭示的工具以便能够完全地存在。”^[9]生命是漂浮在水面的精神,若想生存,它需要借助于自我实现的工具,因为只有外化之后它才能克服物质的障碍,实现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所有生命都是精神性和肉体性的“二元”存在。人类与世界的交往模式是:精神——身体(行动中枢)——物质世界。这一模式的各个环节不可分割,身体在其间起中枢作用,把“物质”与“精神”两类不同的东西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动物只有“内在”的身体,人类有外在的身体。只有借助于外

在的器官,人类才能更好地在一世界中一存在。

不管是前面论述的伯格曼和斯蒂格勒的技术观——他们在现象学运动内部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来克服海德格尔的技术迷思,还是这里所讲的柏格森的技术观——它是现象学运动之外可供我们用以突破海德格尔技术观的得力助手,都是我们超越海德格尔技术理论的有益资源。只有不断破除各种对技术的迷思——海德格尔的迷思只是其中之一,挖掘、拓宽和整合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技术理论,技术哲学才会在哲学殿堂中取得自己应有的席位,才会作为一个学科早日成熟。

[参考文献]

- [1]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 [2] [德]比梅尔.海德格尔[M].刘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4.
- [3]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6.
- [4]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5-63.
- [5] 孔明安.工程科学与技术哲学:从工程科学的特征看技术哲学——德国哲学家H·波塞尔专访录[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7):34-37,51.
- [6] Albert Borgmann. Technology and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y Inquir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7]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09.
- [8]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M]. Translation by Arthur Mitchell.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11.
- [9] [法]梅洛—庞蒂.哲学赞词[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

The Inquiry of Heidegger's Technology Philosophy

SHU Hong-yu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Heidegger's theory of technology has an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oday's technology philosophy field. However, Heidegger's evalu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is negative.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The first, Heidegger's philosophy is an Existence Philosophy, not a Technology Philosophy. He has various prejudic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to technology. The second, by using all kinds of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we can walk out of th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Heidegger's type of technology.

Key words: Heidegger; technology; technology philosophy; inquiry